

内蒙古大学学术丛书

蒙元版刻综录

潘国允
赵坤娟 编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学术丛书

蒙元版刻综录

本书的出版得到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

潘国允

赵坤娟

编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元版刻综录

潘国允 编著
赵坤娟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9.75 字数:240千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 7-81015-629-2/Z·26
定价:12.00元

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

主 任： 旭日干

副主任： 梁希侠(常务) 呼格吉勒图

委 员： 旭日干 梁希侠 呼格吉勒图

曹之江 包 祥 王 璋

刘 成 刘树堂 陈羽云

前 言

《蒙元版刻綜錄》是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科研項目之一，我館潘國允、趙坤娟二同志合作編定。二同志在六、七年中稽考前賢，旁搜書目，仿南京杜氏之例，綴成是錄，別為三卷。

是書為匯輯有元一代刻印圖籍的版本目錄，收官、家、坊主持刻印者近四百家，刻印圖籍千余種。本書以主持刻印者姓氏、齋室名號、機關名稱、地區、年號為綱，書名為目，詳記主持刻印者小傳，盡錄題名、責任者、版式、行款、刻工等事項，是一部學術性、資料性的工具書，對研究元代出版事業、印刷發展史及政治、經濟、文教、科技等均有一定的實用性史料價值，並開辟了蒙古學研究的新領域。

是書在編寫過程中，曾得到北京圖書館和有關藏書單位的協助，提供書影，答復諮詢；又承蒙內蒙古大學副校長包祥教授、內蒙古大學圖書館館長烏林西拉研究館員的大力支持、指導，謹此一并致以誠摯謝意。

內蒙古大學圖書館

1994、1、15

蒙元版刻在中國印刷史上的地位

——代序

弁 言

我中華民族是融合我國境內各族姓宗支而成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建立于我國國土上的一統強大政權者，除三代外、不過秦、漢、隋、唐、元、清而已，至于西晉、趙宋和朱明，雖號稱統一，但不足以稱強大，終因內擾外患，致使無法開疆拓土。而元、清兩朝，其疆土之廣遠，聲威之赫奕，軼于漢、唐盛世，于中華文化史中特具意義，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蒙元帝國的建立，不僅加速了中華民族自周秦以來統一的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且結束了中華民族唐五代以后近百年的分裂割據狀況。其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古往今來，未之有也！

自室韋后裔蒙古國大汗起，至順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市），北走大漠，前后歷時百六十余年。在此一個半世紀中蒙古民族鐵騎馳突，中西交通與文化，賴以進一步拓開與傳播，創造東方民族足以自豪的顯耀歷史。

這一時期東方文化傳往西方的情況，大致上有：隨蒙古軍多次西征，中國重大發明之海陸旅行唯一利器——羅盤指南，傳入歐土。隨後又有火藥、瓷器、算盤、紙幣等，直接間接地傳入近東及歐洲各國。趙宋時已日臻完善的中國版刻印刷術，傳入歐洲及近東地區，尤可稱道，佐維斯（Pau-lar, Jovius）所著《時代

史》云：“廣州北方，有刻字匠甚多，所刻之書多爲歷史禮記等等，其印刷之法，與吾所用之法無大異。教皇利奧曾以一冊中國書示予，謂系葡萄牙國王之贈品，由此可知葡萄牙人未至印度前，塞種人及莫斯科人民皆已致力于此種文化事業矣。”此中國印刷術由俄國傳入西歐，當爲“塞種人”的佐證。再如蒙元所行“寶鈔”，據馬可波羅所言，凡元人勢力所及之地，無不通行。1294年波斯塔布里土城亦造紙幣，上有漢文及阿拉伯文，一切仿效元制，漢文“鈔”字亦印于其上。由印鈔之法行，足以間接助長于印刷事業，此爲中國印刷術流傳之最早者。卡德（1882—1925）著《中國印刷術源流考》（是書有向達和劉麟生二譯本）亦云：“世界發明物中，以印刷術爲最富有國際性，中國發明造紙之術，又試驗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高麗以銅模銅活字，得風氣之先，突厥人傳播雕版印刷于中亞，現存最早活字，仍爲突厥文，波斯、埃及及其近東之國家，西班牙爲之介，至紙張輸入歐洲，由君士坦丁堡之地，歐洲造紙最早之國家，應推法蘭西與意大利。歐洲知有雕版印刷，俄最早，意大利次之。當時雕版印刷之盛，爲日耳曼、意大利與荷蘭，活字印刷亦以荷蘭、法蘭西、日耳曼爲首，而傳之各國。”由此觀之，中華印刷術，蓋實爲世界印刷不祧之祖；自古迄今，中西文化之交流，歷歷可考，而版刻印刷實居其首，蒙元之傳播則爲其首，對中華文化之保存與發揚光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刻書事務專門機構之設立

蒙元貴族統治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自太祖成吉思汗起，就十分重視從被征服的民族中，選拔各種有用人才，委以重任，講求立國之道。開國謀臣耶律楚材，就是由金入元的契丹貴族后裔。他于太宗時期中書令任內，曾召集名儒講經義于東宮，率大臣子

弟聽講，并于燕京置編修所，于平陽設經籍所，倡導學習漢族古代文化。因而，爲文化教育服務的版刻、印刷事業，得到了蓬勃發展。尤其官刻，朝廷專設管理刻書的機構，令專職官吏主持其事。

太宗八年（1236）六月，于汗里八（即今北京市）置編修所，于平陽府沿金之舊制，復設經籍所，掌管、搜訪、庋藏典籍，編集經史。（按：乃從耶律楚材之請，召儒士梁涉充長官，以王方慶、趙著副之。）（見《續文獻通考》）

世祖至元元年（1264）敕選儒生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俸以贍之。至元五年（1268）敕從臣托果斯等錄毛詩、孟子、論語等。

至元四年（1267），并改爲宏文院。至元六年（1269）徙平陽府經籍所于京師。至元十年（1273）正月，立秘書監掌圖書經籍，十一月十七日，太保大司農奏過事內一件，興文署掌雕印文書，交屬秘書監。興文署設官三員，令一員，丞三員，校理四員，楷書一員，掌記一員，鑄字匠四十名，作頭一人，匠戶十九人，印匠十六人。至元十一年（1274），以興文署隸秘書監，掌雕印文書。至元十二年（1275）九月，以伊實特穆爾爲御史大夫，據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秘書省書籍，本監應收經籍、圖書、書畫等物，江南諸郡多有經史文版，具令收拾，現數不教失落。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詔收宋臨安圖籍典故文字。十四年（1277）十二月，中書省奏：奉旨省并，銜名興文并入翰林院。十五年（1278）四月，以集賢大學士許衡（1209—1281，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人）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凡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二十七年（1290）正月，復立興文署掌經版及江南學田錢谷，并召集良工刊刻經、子、史，以《資治通鑑》爲起端。（以上見《秘書監志》及《續文獻通考》）。《天祿琳琅書目》卷五亦雲：“朝廷于京師創立興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厚祿廩，召集良工刻經、子、史

版本，流布天下，以《資治通鑒》爲起端之首，所謂識時務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務雲雲。”

蒙元帝國上層統治者，專設興文署掌刻經籍并以《通鑒》爲起端之首，正反映了統治者講求立國之道的政治需要，急于借鑒歷代封建王朝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天祿琳琅館臣們所言“識時務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務”的評論，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的。

據歷史文獻記載，興文署早在至元十九年（1282），就曾以蒙古畏吾兒字所書《資治通鑒》刻印梓行于世了。

由上可知，興文署是蒙元時期朝廷直屬的規模可觀的刻書機構。

蒙元時期，內府直接管理并專門承負刻書機構的，還有藝文監之廣成局、太醫院、國子監、太史院印歷局，并于江浙一帶附設了印歷局勾管。

自編修所并入翰林院后，文宗天歷二年（1329）二月，立奎章閣學士院，命儒臣進經史。繼而立藝文監，隸奎章閣學士院，專以國語（即蒙語）敷譯儒書及儒書之合校仇者，俾兼治之。同時下設藝林庫和廣成局，藝林庫專掌書籍藏貯，廣成局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人，司吏二人，專印行祖宗聖訓及其國制等書傳刻印造之事。據歷史文獻記載，廣成局以蒙古文刻印梓行之書極夥，若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時武宗已繼位）中書右丞博羅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上命刻事印，諸王之下咸賜之。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時仁宗已嗣位）刊行《貞觀政要》。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四月以《大學衍義》譯國語，次年八月復以江浙省刊印五十部，賜朝臣。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集賢大學士庫春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后學，請令江西行省鋟梓，以廣其傳。另外，《列女傳》、《經世大典》等，皆刊行過，可惜今已全部失傳。尤其在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三月，布哈齊岳玄等所進《大元一統志》，今僅存

殘葉幾片，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惟載其目。他者今僅知伯希和在敦煌發見蒙古文詩一篇，此當蒙古文原本，而非譯自漢字者。此外土魯番曾發現《蒙古經》、佛像及紙幣若干。流存倍稀，如是而已。至于廣成局究竟刻些什么書，格式怎樣，未曾見過實物，難以稽考與描述。

蒙元帝國統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和培養人才，先后采取了尊經崇儒、興學立教、科貢并舉、舉賢招隱、保護工匠等一系列文治措施，以鞏固他們以鐵馬金戈強弓硬弩打下的江山。“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見明·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卷八）早在至元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令設國子監，以儒學大師許衡爲集賢院大學士、國子祭酒，命侍臣子弟入學，并尊吐蕃僧八思巴爲國師，命制蒙古新字，頒行全國。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又置蒙古國子監。立蒙古國子學。至元廿四年（1287）立國子學，置博士、教官掌教生徒。以后諸帝，于以上措施，都有擴充，并分設于諸路、郡、府、州、縣。國子監除隨朝百官，怯薛臺，蒙古及漢人官員之家子弟入學，作成人材，以備擢用外，還承負刻書印行之職，今僅能見到的國子監刻本和宋刊元修本一是延祐（葉德輝《書林清話》作“元祐”，誤）三年（1316）刊印的小字本醫書《傷寒論》十卷（見楊守教《日本訪書志》及《中國版刻圖錄》）；一是宋刻元延祐年間補修本《國語》二十一卷。是書首行篇名在上，大題在下，題曰韋氏解，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宋諱至慎字皆缺筆。元補修之葉版心“國”字作“囯”，無字數，有監生某某銜名（按至元二十四年國子監置生員二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百人。（見《元史·百官志》及《秘書監志》）（見《儀顧堂題跋》卷三）。

蒙元封建帝國內府直屬的專門刻書機構，除上述興文署廣成局和國子監以外，據文獻記載還有太醫院于大德四年（1300）刻過醫書《聖濟總錄》。此外，太史院下設的印歷局，同時于腹里

(按中書省直轄山東西部及整個河北，謂之腹里)、江浙、江西，又分設印歷局勾管，專掌天文歷數和歷書印造事宜。然而印造的數量與規格，已很難稽考了。

這些文治措施，通過長期與廣泛的施行，蒙古統治者雖然主觀上是為維護其封建統治，但在客觀上卻也起到了活躍社會文化，為版刻印刷事業，在全國建立系統的刻書網絡，溝通各族文化，促進蒙古族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的繁榮、發展和提高，加速漢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社會環境和需要的作用。

二、完善嚴謹的刻書體制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定國號為“元”。他建立元朝以後，不但在政權建設上承襲宋、金以來中國封建政權組織的全部體制，並根據當時的社會情勢和政治需要，又加以變化、改革、完善和發展，形成了一套嚴密的有元一代管理體制，反映在刻書印刷事業上，特別是反映在官方刻書管理制度上，也是完善嚴謹的。

就拿蒙元時期歷書印造一事來說，歷書的印制皆由太史院及其特設的印歷局所壟斷，並明文規定印造制度云：“諸告獲私造歷日者，賞銀一百兩，如無太史院歷日印信，便同私歷，造者以違制論。”（《元史·刑法志四·作偽》）

至於蒙古時期書籍，皆由中書省牒下有司或諸路，乃許刻印刊行。（《天祿琳琅書目·茶宴詩注》）所謂牒，即經呈請核準的官刻書籍，把當時所行的列于本書之首的公文。

中書省本是蒙元封建王朝的最高權力機構，政務中樞。它的職責是“典領百官，會決庶務。”最高長官中書令，常以太子兼領，班在一切臣僚之上。左右丞相為其副，其職“統六官，率百司，佐天子理萬機。”當時中書省直轄腹里和十一個行中書省，而又以十

一個行中書省分轄全國一百八十五路，三十三府，三百五十九州，一千一百二十七縣，從中央到地方它都有了指揮權。在版刻印刷事業方面，之所以它也管，正是由於這種封建集權體制所決定，封建統治所必需的，同時也說明蒙元封建王朝對版刻印刷事業上的管理制度的嚴格。

成宗大德九年（1305），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以爲“經史爲學校之本，不可一日無之。版籍散在四方，學者病焉。浙西十一經已有全版，獨十七史未也。職居風憲，所當勉勵。”（見元建康路刊《新唐書·跋》）據孔文聲跋太平路所刊《漢書》云：“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遍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經閣，致工于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訂者學正蔡泰亨。版用 2775 面，工費具載學記，茲不重出。如大德己巳（1305）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二十四日。”（《天祿琳琅書目》卷五）跋后列承務郎太平路總管府判官劉遵督工，江東建康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按伯都，即白巴圖，《元史》有傳）提調……。

此外，由各道肅政廉訪司發起，下九路儒學刻印的十七史還有：大德年間，糾信州路儒學、信州象山書院、道一書院、稼軒書院、藍山書院、玉山縣學、弋陽縣學、貴溪學、上饒學等數處合刻的大題在下小題在上，尚存宋本舊式的《北史》一百卷；版心間有字數及嘉靖十年修版字樣的《南史》八十卷，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學刻印的每卷題曰“太平路新刊漢書”一百二十卷；每卷末有寧國路教授題名的寧國路儒學刊印的《后漢書》；前有大德丁未（十一年，1307）成明瑞序，序后有建康路監造各官題名的建康路刊印的《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晉書》一百三十卷；《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元翻宋本，末有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云云五行的瑞州路等合資刊印的《隋書》八

十五卷。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學刻印的《三國志》六十五卷等等。

這種由各道肅政廉訪司發起，下各路儒學刻印的，除九路儒學糾合或分工刊刻十七史外，可舉實例還有很多，如至元五年（1339），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據本道廉訪使蘇嘉呈請，移文揚州路總管府照行本路儒學，刻印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至正二十五年（1365），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據平江路鎮守司牒請，下平江路儒學刻印鮑注《戰國策》十卷等等，皆是。

蒙元時期，由內府有關單位，經中書省札付禮部，下各路儒學刊印的書籍，如至正八年（1348），由御史臺據監察御史段弼、楊惠、王思訓等呈請，申報中書省，送禮部議準，牒下江浙行省，發各路學刻印宋裴《燕石集》十五卷，延祐五年（1318）由集賢院呈請中書省，札付禮部議準，發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各路儒學刻印的郝文忠的《陵川集》三十九卷，等等。

由皇帝直接下令編纂、刻印的書籍，如至正五年（1345年）江浙、江西行中書省奉旨開雕《遼史》一百六十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前有給江浙行中書省的牒文，稱：“準中書省咨右丞相奏，去歲教纂修遼、金、宋三史，令江浙、江西二省開版，就彼有的學校錢內就用，及早教各印造一百部，欽此。”至正六年（1346）刻《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錄三卷，其前亦有牒文，稱：“精選高手人匠就用，賫去淨稿，依式鑲版，不致差訛。所用工物，本省貢士莊錢內應付。如果不敷，不拘是何錢內放支，年終照算。仍禁約合屬，毋得因而一概動擾違錯。工畢，用上色高紙印造一百部，裝潢完備，差官赴都解納。”

由國子監通過中書省下各路儒學刻印的書籍，如至元六年（1340）國子監牒呈中書省批准，下江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分派慶元路儒學召工鐫刻《玉海》二百卷，《辭學指南》四卷，《地理考》六卷，《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漢制考》四卷，《踐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鄭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救篇補注》四卷，《周書王會補注》一卷，《小學紺珠》十卷，《六經天文篇》二卷，《通鑒答問》五卷等等，皆屬此類。

至元二年（1336）十二月初六日，以杭州路西湖書院名義棗梨的蘇天爵編撰的《國朝文類》，首有翰林國史院待制謝端、修撰王文煜、應奉黃青老、編修呂思誠、王沂等進呈奎章閣稱：“伏都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歷官翰林僚屬，前後搜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爲七十卷。……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若于江南學校錢糧內刊版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翰林國史院得是呈奏又轉呈禮部稱：“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詳，有裨治道。如準所言，移咨江南行省，于贍學錢糧內鋟梓印行。……”最后呈中書札付禮部議準，仍由中書省行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下杭州路西湖書院開雕牒。（《四部叢刊》初集影印本）

綜上數例，足見蒙元刻書，尤其官刻，幾乎從各渠道而來，經逐級審核，逐級呈請，然后通過各路儒學或地方權力機構，由儒學出資刊布流傳。這種管理體制、管理制度，是前此歷代所罕見的，也正是蒙元版刻印刷事業上的突出特點。

三、蒙元之世，有刻書中心與風格

一代有一代民族風尚，一地有一地的社會習俗，一家有一家特色。由于蒙元首都的北移，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亦隨之北遷，版刻印刷事業同樣形成了蒙元一代的中心和風格。兩宋刻書的三大中心江浙、福建與四川，至蒙古族入據中原，不僅江浙、福建的刻書事業依然得到保護，並得到進一步發展，北方的山西、大都北京一帶，刻書事業也逐漸興盛起來，打破了中國版刻印刷業

僅盛行于南方的局面。

蒙元時期，江浙杭州刻書，較有宋一代并無遜色。就官刻而言，朝廷內府不僅刊印了新修纂的宋、遼、金三史，并以九路名義校刊了十七史。當時路、府、郡、州、縣儒學也多以刻書爲己任。

福建繼承了兩宋傳統，有些書坊也得到了發展，有的刻書既多，名氣又大，如余氏萬卷堂至勤有堂，歷經宋、元、明三朝，經營數百十年，實爲版刻印刷史上的楷範。

北方刻書事業，早在蒙元定鼎之前，已形成網點，如平陽府張存惠晦明軒，北京地區趙衍等。定鼎后，曹氏進德齋等也都刻印了不少書，并形成了北方風格。

這就形成了蒙元時代的三大刻書中心，即江浙、福建與平水。這三大刻書中心的風格，雖有共同之點，亦各具特色，概言之如下：

江浙一帶刻書字體多歐體參之吳興體，雕刻精工，版心多白口，間有細黑口，四周文武邊欄居多；多數有刻書序跋、題識和牌記；不避諱，印紙多用黃麻紙、白麻紙兩種，少數亦有用蠶繭紙的。如大德三年至四年（1299—1300）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印的《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刀法道勁，字畫方整，紙墨瑩潔，印刷清朗，可爲蒙元時期江浙刻書風格代表作。（見《中國版刻圖錄》）

福建地區刻書字體沿南宋顏體，不過比南宋顏體要瘦一些，顯得格外圓勁挺拔；版式繁華，出現了一格雙行、上圖下文的兩截版式，版心多用花魚尾，而篇目、小題等之上方常加有魚尾或其它標記符號蓋子，以彰篇目段節，甚爲分明醒目；也不避諱，印紙多用黃麻沙紙與竹紙。福建地域，在蒙元時代，刻書以建陽最出名，刻的多，歷史久遠，技術良好，經濟力量雄厚，有很多書坊，多以刻書爲業，世代相傳。如官刻機關有福建儒學、建陽路儒學、漳州路儒學等；書林書坊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劉氏日新堂、

劉氏翠岩精舍、虞平齋務本堂、麻沙劉氏南澗書堂等。

北宋之后，北方形成了以山西平水（即平陽）、運城，河北寧晉和大都北京為中心的黃河以北的刻書網點，書肆以刻書為業者逐漸興起，其著者有平陽府晦明軒、平陽府梁宅、平水王宅中和軒、平水許宅、高昂霄尊賢堂、司家頤真堂、平陽道參幕段子成等，皆當時北方刻書名肆。特別是蒙元憲宗六年（1256）北京地域趙衍刻印的唐·李賀《歌詩編》四卷，當為北京地區刻書最古之本（見《中國版刻圖錄》）。再如元初宋德方遵其師長春真人邱處機遺意，于太宗九年（1237）倡刊的道藏經，令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陽玄都觀開局總領其事，乃設經局二十有七，據管州所存金藏，搜羅遺逸道經；校讎付梓，有李志全者，亦任校讎之事，至乃馬真后三年（1244），一部宏偉的道藏刊竣，公之于眾，傳播于世。全藏都凡七千八百余卷。因開局校刊于玄都觀，故稱《玄都寶藏》，亦稱《宋德方藏》。是時經版貯于平陽永東鎮純陽萬壽宮內。憲宗朝，釋僧辨王浮《化胡經》真偽，因領旨焚毀道經四十五部經文印版。至世宗至元十七年（1280）又校對道釋，十八年（1281）頒詔：除《道德經》外，其余道藏經文印版盡行焚毀。是年十月于燕京憫忠寺集百官焚道藏經，并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至此時，元刊《玄都寶藏》經版遂被焚盡，而藏經亦因此亡佚甚多，元代以前所刻幾乎滅迹，傳世幸存者，寥寥無幾。（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歷代道藏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變版》）

北方是時干戈征伐，無時或休，其版刻印刷事業能有如此盛況，實系難能可貴。

總觀上述，蒙元時期刻書多且精，素有宋、元版刻并稱之譽，是因蒙元提倡社會文化教育的結果。

四、蒙元儒學、書院刻書，視宋尤盛

觀清嘉定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征，號竹汀）《補元史藝文志》著錄統計，蒙元時期刻印、流通傳播之圖籍，經部爲八百四種，史部爲四百七十七種，子部七百六十三種，集部一千九十八種，凡三千一百四十二種，僅次于清修之四庫之數。

又觀《秘書監考書目》：凡在庫書，經部百二十一部，史部七十九部，集部五十七部，道書三百三部，醫書一十四部，方書八部，先次送庫書一十二部；后次發下書一千一百五十四部；續發下書六百四十二部。

前後歷史僅百六十年來的蒙元一朝，能有如此數量浩繁的圖籍，傳播在社會上，不能不說是很可觀的。

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蒙元之世，能出現這種盛況，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應是：蒙元統治者雖以武功統一天下，但在統一過程中，爲徹底奪取政權和加強政權建設，曾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效立國治邦之策。如定鼎前，蒙古貴族統治者就十分注重尊經崇儒，舉賢招隱。著名大儒、程朱理學的忠實信徒姚樞（1203——1280，字公茂）、許衡（1209——1281，字仲平，號魯齋）早在太宗時就被聘爲上賓，成爲蒙元朝廷內高級統治集團中運籌帷幄、左右乾坤的要員。至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改國號爲元之后，在政權建設上不但承襲了歷代中國封建集權組織的全部體制，并根據當時的社會情勢與蒙元貴族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加以變革、完善和發展，形成了蒙元一代的封建集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爲更有效地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已打下的江山，又接二連三地推行了一系列籠絡人心的文治措施。首先在全國範圍內普遍設立了儒學，建置了學校。據歷史文獻記載，至元二十三年（1286）大司農司的統計，